

人群和组织：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的维度之一

宋雷鸣 汪宁

【导读】“人群”是流行病学研究的关键概念，“组织”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两者关注重心分别是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研究对象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因此“人群”和“组织”的概念在具体研究中应实现互补，成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基本维度之一。

【关键词】 人群；组织；流行病学；人类学

“Group” and organization: a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SONG Lei-ming, WANG Ning.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Ning, Email: wangnbj@163.com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Mega-projects of N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for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of China (No. 2008ZX10001-003).

【Introduction】 “Group” is a key concept in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 is a core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Group takes focus on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while organization take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objects that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two concepts could be complementary in specific studies, and this will be the basic dimens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Key words】 Group; Organization; Epidemiology; Anthropology

随着流行病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视野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专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为对很多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研究，只有结合人文社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才能更为精确、深入和有效地对疾病进行描述与分析。日前，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跨学科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且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但是学理性的总结尚嫌不足^[1-4]。而从学理上对两学科的合作基础进行分析和讨论，是跨学科合作实践的迫切需求，为此对这一基本主题进行探讨。

1.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人群”概念：流行病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是“人群”，即从非个体的角度分析疾病和健康问题。按照教科书的论述，“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现象与健康状态，即从人群的各种分布现象入手，将分布作为研究一切流行病学的起点，而不仅是考虑个人的患病与治疗问题，更不是考虑它们如何反映在器官和分子水平上。我们的目光始终着眼于人群中的问题^[5]。”由于流行病学要观察某些因素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仅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观察一般不够，往往需要观察大量的人群或病例，才能推论相关因素与疾病的因果关系。因此，相对于临床医学及其他

医学学科，流行病学的研究视野更为宏观，往往以特定的“人群”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寻找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各种相关因素（其中包括物理、生物、社会、文化以及行为等）。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的“人群”往往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体。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中部地区出现单采浆献血员感染 HIV 的情况，为掌握这些地区献血员 HIV 感染状况，必须针对献血员进行大规模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为此参加过单采浆献血的献血员成为调查中的特定“人群”，“参加过血浆献血”为调查人群的共同特征。2004 年 9 月卫生部部署全国开展既往献血员筛查，到 2005 年 6 月底，全国献血员艾滋病感染情况基本查清^[6]。可见，流行病学进行调查研究时，必须根据相关的致病因素确定调查对象的具体特征，从而根据这些特征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

2. 人类学研究中的“组织”概念：人类学对“组织”内涵的理解较为宽泛，包括人们互相交往或联系的各种方式、过程和形态等。因此，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既包括企业和政府机构等正式组织，也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等构成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因素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实际上，人总是生活在各种组织之中，如家庭、宗族、村落、企业和族群等，其身份、特点和利益诉求等往往会通过组织的方式得以体现和获得实现。因此，人类学对人及其文化的研究往往以一定的组织为单元或边界。人类学对其四大传统研究主题亲属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研究，一般是在具体的亲属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中展开的。只有认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2.04.021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2008ZX10001-003)

作者单位：102206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汪宁，Email: wangnbj@163.com

识了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在具体组织中的运行情况,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些主题。反之,人类学也是通过上述基本主题来研究和分析人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人类学家在对非洲草原上的努尔人进行研究时发现,其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可在最基本的亲属关系或亲属组织中找到原因和根据。因此,了解努尔人的亲属、经济和政治主题,也就了解了努尔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7]。可以说,研究和分析世界上不同地区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人类学学科的核心任务之一,而人类学强调的所谓“多元文化”及“普同人性”就蕴含和表现在缤纷的组织形式中。可以说,“组织”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类似于流行病学对“人群”的重视程度。

人类的组织形式千姿百态,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纷呈。对“组织”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人类学,人文社会学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均对组织研究兴趣浓厚,但各有侧重,分别以“权力”、“制度”、“经济”、“利益”、“技术”和“文化”等为关键词或出发点,分析各种具体的组织形态及其变化,进而探讨影响或决定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其中人类学对“组织”的研究以“文化”为基本切入点^[8],着重强调“作为文化的组织”^[9]。人类学在组织研究中强调的社会文化内容,正是目前流行病学研究实践迫切需要的。

3. 流行病学研究中对“组织”分析的重要性: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人群之间可能具有复杂的联系或交往。如上述案例中,同样参与“卖血”者之间可能有某种密切的关系,从而互相影响“卖血”行为。我国中部地区一些“艾滋病村”的形成,往往与具体村庄“卖血”的组织方式有关。在很多具体研究中,某些“人群”中的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这些人群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往往成为影响疾病传播和暴发,以及考虑如何控制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埃博拉出血热第六次流行为例。2000年9月乌干达一名妇女因患埃博拉出血热死亡,为该次流行的首发病例。按照当地传统,尸体要在自家茅草屋内放置几天等待亲人参加葬礼,且葬礼上亲友要为死者清洗身体,然后在一个公用的面盆内净手以示家族团结。因此,葬礼后不久,死者的母亲、3个妹妹和另外3个参加葬礼的亲戚陆续感染埃博拉出血热死亡。基于类似的方式,埃博拉出血热在乌干达暴发,至2001年1月23日该国共报告425例病例,其中224例死亡,病死率为52.7%^[6]。显而易见,该案例中,乌干达当地的亲属组织和葬礼组织形式成为埃博拉出血热传播和暴发的重要因素。而了解这一组织方式和组织过程,对于预防和控制埃博拉出血热在乌干达地区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与“人群”相关的各种“组织”也应成为流行病学调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组织”往往被掩盖在“人群”之中。在一些流行病学调查中,某些“人群”中的人们仅表现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共同特征,但在致病相关因素上并不存在真正关联。例如,以收入、职业和社会阶层等特征划分“人群”,往往只能较为间接、概括或模糊地说明疾病的分布情况。而有关疾病传播的更为具体和清晰的过程及方式,显然需要以人群“组织”的视角来发现和揭示。

流行病学调查也颇为注意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的“结构”问题,其中一些内容包含“组织”的特征和因素。如根据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以及职业等进行区分或分类时,不同性别或年龄级的人之间可能具有不同的联系和交往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组织特点。但这些结构上的考虑对于“组织”的关注尚显不足。如在艾滋病研究项目中,通常把女性性工作者(FSW)按照场所分为几个等级,如高档酒店等娱乐场所、街边发廊和出租屋等。按照场所的区分体现出FSW的人群构成,但是不同场所内的FSW又各有其组织和流动的特点,因此还需分析其具体的组织特征,这样才能更深入和细致地揭示其相关行为特征。

4. “人群”与“组织”间的关系及其应用:基于把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相结合的考虑,有必要了解“人群”和“组织”之间概念的关系。

首先,从范围而言,“人群”和“组织”相互交叉,人群中包含着组织,组织中也包含着人群。如要调查某地FSW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情况,那么当地的FSW便是流行病学调查的“人群”。同时,FSW往往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如她们通常活动在出租房、发廊和酒店等场所,以各种身份隐藏和组织起来。另外,除这些相对正式的组织形式外,FSW间也多有同学、同乡和亲属等非正式的组织关系,而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不仅包含着FSW,还会包括亲属、男客和老板等其他相关人员。

其次,从内容而言,“人群”和“组织”相互影响。如果说“人群”概念的关注点是人们的某种分类标准或共同特征,那么“组织”概念的重心则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组合或结构等。许多组织往往是由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人所组成,而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间的交流和互动往往又会影响人们的一些具体特点。比如,同性恋组织一般是由同性恋者组成,而具体的同性恋者参与这些组织后,往往会从这些组织中学到一些亚文化,从而获得某些更为具体的组织特征。鉴于许多“特征”是在各种交往互动中获得的,“人群”的关注点和“组织”的研究重心显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

最后,就视野而言,“人群”和“组织”是倾向于互补的。“人群”是以某些共同特征为标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和整合,往往能够统摄较大的样本量,并以此进行统计学分析。因此,“人群”概念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在这种代表性基础上可以推而广之的宏观情况。比如,在随机抽样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学分析,可由一定量的样本推论到更为宏观的总体情况。由于“组织”概念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情况,其中往往包括各种具体行为及其规则等,有时还会结合一些具体事件或案例对行动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因此“组织”力求深入探讨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规则和文化。由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基于具体案例基础上的“组织”不易直接推论至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比如,彝族利用其传统“虎日”仪式所蕴含的家支组织和宗教组织力量有效进行戒毒^[10]。但该组织形式却不易直接推广到其他文化或地区,而必须结合不同地域或族群的文化特点,进行某种可能性转换。换言之,“虎日”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其他族群或地区在相关工作中的启

发意义,而非直接应用的范本。综上可知,“人群”概念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总体的情况,倾向于“宏观”;“组织”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过程及其体现出的规则和文化等,倾向于“微观”。在实际研究中,两者相结合非常有必要,如宏观“面”上的总体估计和微观“点”上的深入挖掘,可实现验证、补充和完善,即所谓的“蝗虫法和鼯鼠法”^[11]。

“人群”和“组织”概念的分野,有利于在具体研究中采取跨学科的分析,从而对研究内容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比如,在笔者参与的一项关于“老年嫖客和低档暗娼艾滋病感染风险”的研究中,研究者一方面采用统计学方法,对相关人群的基本情况、艾滋病知识以及有关态度和行为等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访谈和文献法,挖掘相关人群的组织形式及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基于“人群”的视角,从量的角度获得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概况。基于“组织”的视角,发现了该人群的组织特点:按照“类家族模式”组织起来,其性交易活动受制于当地的集市周期,本地族群文化也对性交易活动产生影响等^[12]。研究中通过对相关人群组织活动特点的了解,有利于对统计学结果进行更为深入的解释,从而便于寻找影响艾滋病传播的关键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由此可见,人类学对“组织”的研究不限于其间的组合和互动方式等,还致力于挖掘影响或决定组织内部人们之间关系的文化因素。因此庄孔韶和李飞^[19]提出“作为文化的组织”概念,强调“组织”研究中的文化视角^[16,13-15]。

5. 结语:综上所述,“人群”是相对个体而言,强调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要素的人的集合体,而人群间的区分体现在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分类标准。“组织”针对人间的联系和互动,强调实际存在的关系形态和互动方式。由于人们的各种“特征”往往与“关系”密不可分,且这种“特征”和“关系”还分别体现出倾向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研究视野,因此“人群”和“组织”的研究应实现有效结合。

参 考 文 献

[1] Lambert H, McKeivitt C. Anthropology in health research: from qualitative methods to multidisciplinary. *Brit Med J*, 2002, 27: 210-213.

[2] DiGiacomo SM. Can there be a “cultural epidemiology”? *Med Anthropol Quar*, 1999, 13(2): 436-457.

[3] Trostle JA, Sommerfeld J.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Ann Rev Anthropol*, 1996, 25: 253-274.

[4] Trostle JA. Epidemiology and culture (流行病学与文化). 刘新建, 刘新义, 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5] Li LM. *Epidemiology*.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3: 11. (in Chinese)
李立明. 流行病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11.

[6] Li LM, Zhan SY. *Instances of epidemiology*. 4th.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84-93, 150. (in Chinese)
李立明, 詹思延. 流行病学研究实例.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84-93, 150.

[7] Pritchard E. *The Nuo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努尔人: 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8] Wright S. “Culture” in anthrop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udies.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9] Zhuang KS, Li 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to the modern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cultures. *Study Ethnics*, 2008, 3: 51-60. (in Chinese)
庄孔韶, 李飞. 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 *民族研究*, 2008, 3: 51-60.

[10] Zhuang KS. A probe into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civil drug control in the Yi Ethnic Region of Little Liangshan on the development in a new direction of visual anthropology. *Study Ethnics Cuangxi*, 2005, 2: 51-65. (in Chinese)
庄孔韶. “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兼论《虎日》影视人类学片的应用新方向. *广西民族研究*, 2005, 2: 51-65.

[11] Zhuang KS. Methods of “Locusts” and “Mole”: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other disciplines. *Open Times*, 2007, 3: 131-150. (in Chinese)
庄孔韶. “蝗虫”法与“鼯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开放时代*, 2007, 3: 131-150.

[12] Zhuang KS. *The risks report of HIV infection of old clients and low level places commercial sex workers*. Beiji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of Renmin University, 2010.
庄孔韶. 老年男客和低档暗娼艾滋病感染风险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2010.

[13] Zhuang KS, Li F. Anthropological study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 as culture—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sex workers in three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controlling and intervening HIV/STI. *J Guangx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10, 2: 53-60. (in Chinese)
庄孔韶, 李飞. “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0, 2: 53-60.

[14] Zhuang KS. New tren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xual diseases and HIV/AIDS in Chin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s. *J Guangx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07, 1: 58-65. (in Chinese)
庄孔韶.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7, 1: 58-65.

[15] Liu Q. *Culture and self-discipline in HIV prevention*. Beijing: Chinese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0. (in Chinese)
刘谦. 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16] Zhuang KS, Yang HL, Fu XX. Revelation of the “Tiger's Day” initiative in the Yi Ethnic Region of Xiaoliangshan. *J Guangx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05, 2: 38-47. (in Chinese)
庄孔韶, 杨洪林, 富晓星. 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5, 2: 38-47.

(收稿日期: 2011-11-08)

(本文编辑: 张林东)